

## 評介李汾陽著《文化資產概論》<sup>\*</sup>

黃翔瑜<sup>\*\*</sup>

李汾陽，《文化資產概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一版。238頁。

### 一、前言

昔臺灣文化資產的研究或相關論述大多出自於建築、文化資產、考古、景觀及都市設計等學門，致該研究領域不啻為其發言之重要場域，然其中甚少見歷史學門研究者投以關懷。再觀察邇近文化資產論著之出版情況，除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暨附屬機關等政府出版品外，私家論著計有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2011年4月）、<sup>1</sup> 林君成《臺灣文化資產概論與研究》（2010年6月）<sup>2</sup> 及李汾陽《文化資產概論》（2010年7月）<sup>3</sup> 等三書接續問世，致該議題研究熱度提升不少。然有趣的是，林君成、李汾陽兩人係歷史專業出身，一反過去學門偏廢的現象，這現象頗值得注意。然此看似熱絡、討論蓬勃的景況，但諸書內容實有良莠之別，宜作辨析。

---

<sup>\*</sup> 本文承蒙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1年9月3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10月31日。

<sup>\*\*</sup> 國史館助修

<sup>1</sup> 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臺北：遠流出版社，2011年4月初版）。

<sup>2</sup> 林君成，《臺灣文化資產概論與研究》（臺北：鼎茂出版社，2010年6月初版）。

<sup>3</sup> 李汾陽，《文化資產概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初版）。

查林、李兩人雖歷史學出身，惟鑽研領域有別。林係以軍事起家，李卻發軔於制度，且李沉潛清代法制史研究良久，<sup>4</sup> 其近十年研究略有轉向，轉涉獵文化資產領域。<sup>5</sup> 去（2010）年7月，發表《文化資產概論》（以下簡稱本書）一書，將其近十年研究心得著書立說，堪稱適格。今作者既出身歷史學，且已鑽研法制史多年經驗，應不乏有深刻性之制度變遷的考察；再本書係新近專著，以今議題熱度論，是書的問世不無有展現成果之動機，或有開宗立說之意圖。基於前述的內外諸因，爰之評介。

## 二、要旨暨特色

本書凡6章18節，計240頁，除第一、六章緒論與結論外，餘為第二章「世界文化遺產保存的組織與現況」、第三章「我國文化資產的起源與發展」、第四章「文化資產分類概說」、第五章「文化資產的應用」及附錄等七部分。

第一章「緒論」略有五旨，首揭文化資產保存法制的開展淵源。緒論開頭即稱：「……文化遺產的指定保存被用來激發民眾認同意識的重要途徑，進而促成了世界各國陸續將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的制度化。」此不啻表明立論旨趣，即主張文化資產保存法制化係國族認同之具體表現。其次，條析戰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理念與實踐。再次，揭示1971年以來

---

<sup>4</sup> 李汾陽，〈清代倉儲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9年）；李汾陽，〈清代蠲卹制度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9年）；林君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始末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4年）；林君成，〈十九世紀中國的禦侮戰爭——以中法戰爭臺灣戰役（1883-1885）為論述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96年）。

<sup>5</sup> 李汾陽，〈文化資產維護專題——古蹟保存〉，《通識教育年刊》（2003年）；李汾陽，〈臺灣地區古蹟保存與歷史意識建構關係〉，《2003社區營造與知識份子的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中國哲學研究中心，2003年），頁1-11；李汾陽，〈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的發展與特質（1984-2007）〉，《通識教育集刊》，第13期（2003年6月），頁1-16。又2006年曾指導王建敦〈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階段性修法之研究（1982-2005）〉（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1篇。

我國文化保存法制化的實況，稱 1982 年 5 月 26 日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為文化保存法制化之創舉。其四，指摘今文化保存所遭遇的困厄，即 5 年來（自 2005-2010 年）文化事權不斷擴大，而政府預算規模卻無法同步增長。其五，建議政府未來文化保存政策應朝向多元文化發展的途徑，促進歷史與文化意識的覺醒，以喚醒社區居民的共同記憶，進而維繫社區的認同。

第二章「世界文化遺產保存的組織與現況」，旨論國際文化保存組織、條約體系及世界遺產屬性分類等。作者從 1945 年成立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談起，並兼論相關或附屬機構群。而這些機構群不斷藉條約與協定締結簽訂，實踐全球各地文化保存的工作，如 1954 年「軍事衝突下的文化資產保護協定」、1962 年「關於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1964 年「威尼斯憲章」、1972 年「保護世界文化遺產暨自然遺產公約」、1982 年「佛羅倫斯憲章」、1987 年「華盛頓憲章」、1994 年「奈良宣言」、1999 年「布拉憲章」、2003 年「會安宣言」、2004 年「整修巴姆文化遺產宣言」，以及「首爾宣言」等。

第三章「我國文化資產的起源與發展」，旨論臺灣日治以來有關文化保存法制的歷史軌跡，從日治時期的「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以下簡稱史蹟法）談起，又 1945 年 10 月繼受國民政府「古物保存法」（以下簡稱古物法），及至 1982 年 5 月公布「文資法」暨「文資法施行細則」止。其中不少篇幅在引介「文資法」暨「文資法施行細則」，如立法修正沿革、法定類別及保存管理方式等；續而分析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暨各縣市文化預算、經營規模及人力運用。

第四章「文化資產分類概說」，本章係以 2005 年修正公布「文資法」第三條內容為據，敘述其分類暨規範，依序以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有關文物、古物、自然地景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暨保存者等 8 類述論，並從主管機關、等級區分、調查指定、變更處分及管理維護等層面分析，據以得出該法體現由中央集權逐漸邁向地方分權的特色。

第五章「文化資產的應用」，揭示保存與應用互為表裡，且陳明保存工

作應具備原真性、整體性、可讀性及永續性等特質，藉此吸引人們的懷舊情懷，而提升文化資產觀覽產業，例舉古蹟與歷史建築空間再利用，如臺北之家、臺北故事館等個案。亦指出發展觀光產業必須展現文化的內涵，尤要能與生活情境相互結合，而發掘在地人文與自然景觀資源，以振興地方的經濟發展。

在第 6 章「結論」，反省今之保存爭議暨總成各章敘述，也於頁 147 揭示當今的困境，首揭臺灣文化資產正臨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保存的兩難，國族認同與文化保存制度如何協調，文化保存法規暨技術淪為政爭工具（指 2007 年 3 月中央政府與北市府的中正紀念堂爭議事件），以及族群等差暨文化序列不斷干擾保存工作進行等。同時，也提出日後文化資產保存應朝向與人民記憶連結暨區域多元文化的特質。

### 三、問題與討論

今本書的作者係歷史專業出身及具有制度專長所為之當代文化資產論述，其研究意圖是值得肯定，但若干立論尚有審酌之處。今以書名、史料運用及論點等方面，進行評析：

#### （一）書名

書名題旨為《文化資產概論》，既稱「概論」，理當有「概論」所應具備的形式要件，如文化保存背景淵源或思想基礎的敘述、保存概念或重要名詞的釋義、保存理論或原則的類型特色、保存制度與技術的建構，以及未來趨勢與制度展望等要件，但綜觀全書多著墨於 2005 年修正公布的「文資法」，以及其施行細則等內涵，如第 3、4 兩章。以前述概論所應具備的要件檢視全書章構的設計，顯然過於單薄，仍待補強。因此，今書名題旨與文旨顯不相稱，或可改稱《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要義》較為妥適。再考察書內章節的比重，除第 2、3 章較為均衡外，餘 4、5 兩章明顯失衡，前者多如 8 節，而後者卻僅 2 節，故本書的章構實有重新審酌的必要；且全書注釋與徵引書目

體例不一，不符學術撰述的規範。

## （二）史料運用

考察本書所運用史料多係 2000 年後之二手論著暨網路資料。今隨著時代的進步，徵引網路資料本無可厚非，但須有適切性，且須註明瀏覽日期，以符規範，作者顯然疏忽了此點。

又論列我國文化資產的起源與發展（即第三章），竟以日治時期「史蹟法」為起點，先毋論其主體有無國別混淆之嫌，但日治時期臺灣文化保存的法制建構是否可視為我國文化資產起源發展之範疇，這看法宜再三思。再考察日治時期的論述，竟無一處取自臺灣總督府官府報或其他日治時期文獻史料，且毫不避諱全部徵引吳永華《臺灣歷史紀念物》一書，此作法似有不妥。又論戰後臺灣的文化保存法制，竟以簡短地十行文字交代在臺施行達 38 年的「古物法」，此敘述手法不僅過於輕忽，所為論述亦有偏廢。如頁 39 僅引註「古物法」第一、九兩條，餘無參考《國民政府檔案》或其他二手論著，使人不得不懷疑作者對本議題史料之掌握程度。簡言之，作者立論咸無一手史料的支持，實有失之穩健。況且，論現行「文資法」固無不可，但無參酌他源史料的情況下，單就法論法是難超脫條文規範框架而有所新創，僅是徒費摘錄之功而已。

## （三）論點

有關書中論點，可商榷者有以下七項：

### 1. 「古蹟保存運動」與「文化保存法制化」對應「國族認同」的問題

書內頁 6-7 闡述近 30 餘年來我國文化保存法制化之相關歷程，自 1981 年 11 月設置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1982 年 5 月公布「文資法」，及至 2005 年「文資法」迭經五次修正，再 2010 年修正「行政院組織法」將在 2011 年成立文化部等；又其間多徵引顏亮一所稱的「國族

論述」。<sup>6</sup> 在緒論開頭指出文化遺產指定暨保存係激發民眾認同意識的重要途徑，進而促成各國文化保存觀念的制度化。深考該立論理絡似乎曲解顏亮一的論述語彙，也混淆了「保存運動」與「保存法制化」兩者在內涵上的差異。<sup>7</sup> 而顏亮一所稱「古蹟保存運動」與「國族認同」並非僅存單一對應的關聯，且有抗拒邊緣化與發展文化旅遊等兩種關係。今作者雖稱引顏亮一古蹟保存的現代性論述，卻忽略抗拒邊緣化與發展文化旅遊等餘兩種可能性，顯然有限縮顏亮一的解釋，又過度渲染國族認同意識之虞。

## 2. 「國族認同」與「區域多元文化」的詮釋效度問題

顏亮一論述國族與古蹟保存的現代性時，稱「國族遺產」是國族意識的象徵，係現代民族國家用以生產與再生產之國家地理與歷史想像的工具，後例舉英、法、義三國說明，並無本書作者所稱還有美、日、中（1928-1949 年的中國）三國。作者在此顯然又擴張顏亮一的詮釋範疇。今非否定「國族認同」在保存行動中所發揮的催化作用，而是懷疑真如作者所稱，其與文化保存法制化僅存在單一的對應關聯；又本書在頁 147 也強調「區域多元文化」，然此「區域多元文化」是否如「國族認同」一樣已存有「同質性」的弔詭呢？國族論述無疑是預設同質性文化的前提，那區域多元文化的主張是否也如同國族論述一般，也預設同質性的城市或區域文化呢？究實，國族認同的取向與多元區域文化的研究取徑均共享「同質性」的前提。準此，後者與前者的差別，即範圍區域大小的差異而已，而其內涵殊無二致，故此詮釋架構仍有待審酌。

---

<sup>6</sup> 顏亮一，〈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遺產——古蹟保存理論之批判性回顧〉，《地理學報》，第 42 期（2005 年），頁 7。顏亮一論述當代古蹟保存運動與現代性發展之關聯曾提及現代古蹟保存運動與現代發展大體存在三種不同型態的關聯：第一，古蹟保存是現代民族國家用來建構「國族認同」的重要工具之一；第二，古蹟保存是不同地域社會或經濟文化的弱勢族群來避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邊緣化的文化手段；第三，古蹟保存是城市或鄉鎮在後現代世界中發展文化旅遊業的主要策略。

<sup>7</sup> 在此先還原顏的觀點，顏稱現代古蹟保存運動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國族認同」的工具之一，此係強調「保存運動」與「國族認同」的關聯性，而非本書所要訴求「保存法制化過程」與「國族認同」的關係；畢竟保存運動與保存法制化兩者截然有差，前者是社會行動，後者是立法過程，兩者不容混淆。

### 3. 日本與中國文化保存法制的淵源問題

在緒論頁 1-2 稱日本與中國之文化保存法制同屬歐洲「國族建構」的脈絡。此項論點顯然欠缺中、日兩國相關文獻上的支持。考察相關文獻，不難發現 1919 至 1930 年東亞的日本、臺灣、中國三地正先後接受現代性的文化保存法制化的洗禮，但此三地卻各有各的淵源，實與作者所稱「國族認同」的論點差以千里。

先檢視 20 世紀初日本內地與其殖民地臺灣的文化保存法制的濫觴。

#### (1) 日本

據李國玄的研究指出，自「明治維新」後，因「尚新厭舊」的時代氛圍，再加上現代化設施的興建，導致古代珍器寶物多有佚失，於是在明治 4 年（1871）太政官公布「古器舊物保存法」，以為興建集古館暨管理保存古器舊物之準據，而相關維護由國庫支出。再大正 2 年（1912），日本史蹟名勝調查委員黑板勝美在《史學雜誌》第 23 卷第 5 號（1921），發表〈史蹟遺物保存に關する意見書〉，其稱：

20 世紀初，歐洲各國競相著手進行史蹟遺物的保存事業，以及嘗試進行相關學術研究，同時制訂極為精細的取締法令，用以監督保存史蹟遺物，可為今後我國制訂相關保存法令之參考。<sup>8</sup>

同時，深受德國近代學術傳統影響的三好學博士，戮力鼓吹天然紀念物保存運動，並號召成立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協會。大正 3 年（1914）該協會會報創刊發行。大正 8 年（1919）3 月 8 日，該協會向帝國議會提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律案ヲ建議ス」，並由該會評議員水野鍊太郎向議會說明立法要旨。同年 4 月 9 日，日本帝國議會通過該法律案，並以法律 44 號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此即日本現代性文化資產保存的開端。<sup>9</sup> 由此可見，日本現代性文化資產保存觀念係與學習歐美文化保存法

<sup>8</sup> 引自李國玄，〈日治時期近代博物學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之研究〉（中壢：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5 年），頁 3(6)。

<sup>9</sup> 引自李國玄，〈日治時期近代博物學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之研究〉，頁 3(30)-3(33)。

制、博物學的發展及博物館的興起三者密切關聯。

## （2）臺灣

20 世紀伊始，臺灣也興起一股保存風潮。臺灣慣習調查會在明治 39 年（1906）所刊《臺灣事情》內有〈本島史蹟の保存〉一文，其稱：

本島（指臺灣）數百年歷史以來，歷經荷蘭、西班牙，中國，以及日本等時代的統治，期間兵燹，致古文書與古建築日益毀失，又各地市區改正、道路修築等工程施作，造成史蹟毀壞，而至舊蹟毫無留存。若以既往情況推估未來，本島史蹟將飛灰湮沒，敦請本島官民密切注意。當局者並非漠視本島史蹟保存的重要性，而是經費不足之緣故。……史蹟保存與島民同化，並無關聯。今若能保存島內史蹟，島民反而愈心歸嚮往，對本島統治與教化有莫大的助益，況史蹟保存，非僅一國一部，而是為世界學術之研究。吾衷心企盼文明，能盡速在島內傳佈，更期島內官民，如內地（指日本）國寶、古寺一般，重視本島史蹟保存事。<sup>10</sup>

1922 年 12 月 29 日，臺灣總督府公布「行政諸法在臺施行令」，但礙於行政配套與預算編列等因素，遲未落實文化保存之作為。<sup>11</sup> 1923 年 9 月 20 日，臺灣博物學會以素木得一會長名義，向臺灣總督內田嘉吉建言，呈〈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に對スル建議書〉，力陳臺灣自然環境之特殊性，其不僅為自然科學研究之世界寶庫，且在人文歷史上經荷蘭、明鄭等階段開墾，仿如一獨立國，不啻為人類學研究的最佳田野。再因近代文明的開發、人為的濫伐濫採，以及病蟲害侵襲等破壞因素，遂建議當局師法歐美文物保存法制，儘速設置保存機關與制訂相關保存法律，以防止臺灣島內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逐漸滅失。<sup>12</sup> 適臺灣總督人事更迭、立法配套及預算編列

<sup>10</sup> 臺灣慣習調查會，〈本島史蹟の保存〉，《臺灣慣習記事》，第 6 卷第 10 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6 年初版），頁 142。

<sup>11</sup> 王泰升，〈日治時期臺灣套別法域之形成與內涵〉，收入臺灣法學會編，《臺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臺北：臺灣法學會印行，1996 年 3 月），頁 143-144；〈本島史蹟の保存〉，收入臺灣慣習調查會編，《臺灣慣習記事》，第 6 卷第 10 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6 年初版），頁 142。

<sup>12</sup> 素木得一，〈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に對スル建議書〉，引自黃俊銘，《日據時期臺灣文化資產研究與保存史料彙編——以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相關文獻

等問題，而未予以積極回應。1926年8月15日，該學會再以會長中澤亮治名義向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呈「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再建議案」，除再揭前會長素木得一建議書的要旨外，更指摘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遭不可抗力而滅失，不啻為國家之重大損失。<sup>13</sup>

在臺灣博物學會的力爭與相關報紙輿論的宣傳下，總督府終於在「行政諸法在臺施行令」公布後8年，即在1930年9月21日，以「府令35號」公布臺灣文化保存之法源，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施行規則」11條，訂同年11月1日施行；再同日又以「訓令第73號」，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取扱規程」15條，亦於同日施行。<sup>14</sup>同年10月16日，總督府再以「訓令第84號」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規程」，該調查會隸屬臺灣總督府，專責島內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之調查審議。<sup>15</sup>

前述日本內地與殖民地臺灣之現代性文化保存史實，係各有各的背景與因緣，日本內地因學習歐美法制、監督古物等因所驅使；而臺灣係因島內史蹟毀壞、舊蹟無存，及其自然地理與人文歷史之特殊性等使然，進而導入日本內地的「史蹟法」。故兩地文化保存之歷史脈絡與本書所稱「國族認同」實有扞格。

---

為主（文獻彙編部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85年10月），頁42；歐素瑛，〈素木得一與臺灣昆蟲學的奠基〉，《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4期（2007年12月），頁165-166；〈天然記念物の保存〉，《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42號（1919年11月），頁29-30；〈臺灣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に對する〉，《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13卷第68號，頁41-43；堀川安市，〈素木會長〉，《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素木博士還曆記念號），第33卷242-243號（1943年），頁362-364。

<sup>13</sup> 中澤亮治，〈臺灣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に對スル再建議書〉，《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16卷第88號，頁88；黃俊銘，《日據時期臺灣文化資產研究與保存史料彙編——以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相關文獻為主（文獻彙編部分）》，頁43。

<sup>14</sup> 〈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取扱規程〉（昭和5年9月21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典藏號：0071031064a002。

<sup>15</sup> 〈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施行規則制定〉（昭和5年9月21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典藏號：0071031064a001；〈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會規程制定〉（昭和5年10月16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典藏號：0071031083a001。

### (3) 中國

今再檢視中國的文化保存法制濫觴，早期多以「令」或「行政命令」形式為之，少見以系統性的「法律配套」形式進行規範，如 1914 年 6 月，北洋政府在大總統發布「限制古物出口令」，又令稅務處妥善擬訂「禁止古物出口辦法」；<sup>16</sup> 1916 年 10 月，內務部頒布「保存古物暫行辦法」5 條暨「調查古物表式」等，<sup>17</sup> 又 1928 年 9 月 7 日，內政部備查的「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係屬行政命令之性質）<sup>18</sup> 等。上揭保存法令不僅性屬零星，且無相關系統之配套。

然真正具有現代性、系統性及實踐性之文化保存法律之起點，應該從 1930 年國民政府制訂「古物法」起算。而該法誕生應起自 1928 年 12 月 30 日，係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呈請國民政府速訂相關文化保存法律，用以限制中外不得任意掘取境內古物。<sup>19</sup> 據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稱：

竊以為中國為世界古國之一，開化最早。雖有古史流傳九頭十紀之說，未足信據。然自炎黃而後歷代相承，實有四千餘年不斷之歷史紀錄。即世界最古之國，如埃及者，亦所不及，餘更無論矣。海通以遂，外國人對我國典章文物搜討，不遺餘力，故古物流傳海外極多，例如敦煌石室發掘之大篆、竹簡及古畫具，又如掘出殷墟甲骨等類均為國家瑰寶，大半為外人收買，良堪痛惜。近年歐西學者有原始人種發源於蒙古之說，是以美國、瑞典、俄國均

<sup>16</sup> 「大總統發布限制古物出口令」、「大總統令稅務處妥訂禁止古物出口辦法令」，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6 月初版），頁 185、188。

<sup>17</sup> 「內務部擬定保存古物暫行辦法致各省長都統飭屬遵行咨」、「內務部為調查古物列表報部致各省長都統咨」等，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頁 197-201。

<sup>18</sup> 「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修正後准予備查由」（民國 17 年 9 月 10 日），〈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0011；包遵彭，《古物保存法》（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 55 年 5 月初版），頁 7。

<sup>19</sup> 「呈據該（河北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嚴智怡提議請通令全省，嗣後無論中外人民非得省府許可，不得任意發掘古物，並轉予國府擬定法律，明令限制。經議決通過，除飭屬遵照外，擬請明訂法律，明令限制。」（民國 18 年 1 月 8 日），〈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11004。

有大規模考古團在中國西北、甘陝、蒙古一帶發掘地層，以搜求化石及古生物骨骼等類。在彼西人未嘗不以裨益世界文化及學術為口實。然一國之領土主權所及，不限於地表，上至天空，下及地層，均為國家管領。所有外人任意掘取古物必應為吾國法律所嚴禁。為此提案，擬請鈞府鑒核，通令全省，無論中外人民非得省府許可不得任意發掘古物并與轉呈國府擬定法律明令限制，以保文化，而維國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等，因當經職府委員會議決通過，除令飭所屬一體遵照外，擬請鈞府釐訂法令，明令限制，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請鑒核施行，謹呈。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sup>20</sup>

從上揭史料，即說明國民政府制訂文化保存法制的原初動機，係起於「搶救國寶」之使然。1929年1月10日，國民政府文官處將案移牘立院，進而啟動法制化程序。<sup>21</sup> 1930年6月2日國民政府分別以「訓令324號」通令各直轄機關，又「訓令325號」指示行政院公布「古物保存法」，<sup>22</sup> 訂於1931年6月15日施行。<sup>23</sup> 可見中國國民政府之現代性文化保存法制的發展，係搶救國寶有以致之。

簡言之，東亞的日本、臺灣、中國三地文化保存法制開展史實咸與作者所稱「國族認同」說法迥異，這亦曝露作者對日本、臺灣、中國三地相關法制史實之發展，以及所掌握的史料仍待補強，似不可遽下論斷。

<sup>20</sup> 「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呈」（民國17年12月30日），〈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11004。

<sup>21</sup> 「河北省政府呈請釐訂法律明令限制中外人民不得任意發掘古物案」（民國18年1月10日），〈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11004。

<sup>22</sup> 「明令公布古物保存法訓令知照」（民國19年6月2日），〈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11004。

<sup>23</sup> 「古物保存法施行日期」（民國20年6月13日），〈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11004；「明令規定本年6月15日起為古物保存法施行日期，通令飭知由」（民國20年6月13日），〈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11004。

#### 4. 國際保護公約暨協定之制度變遷的論述

今作者係制度史之專家，對制度變遷暨保存理念更迭有深刻的見地。第二章不厭其煩臚列各類保存憲章暨各國協定，但對其理念脈絡、發展大勢暨典範移轉卻著墨不多，實無法揭明戰後全球文化保存思維的開展暨相關制度建構之論述，甚為可惜。又本章「未來發展重點」一節內稱，臺灣自 1971 年退出聯合國迄今，無從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各保護公約，儘管擁有國際級的人文遺產與自然景觀，仍處於國際體制之外，此言固然不差；但後續又建議國人與各級主管機關在體認此孤獨外，應努力認清世界文化保存之趨勢，對內教育，對外宣導，努力爭取支持，企求一舉衝破困境，讓文化資產有機會登上世界遺產名錄。此不啻為作者的期待，今臺灣不具聯合國會員國身分，其申請世界遺產之任何努力係屬惘然。

#### 5. 論述主體混淆的問題

第三章論述我國文化資產的起源暨發展，既然論述主體定位在我國，即中華民國，但章首論述淵源卻從日治時期文化保存暨法規談起，再結論稱：「1930 年以來的文化資產的 80 年發展，……」此時間斷限究竟是以何種立場來推演其論述的對象呢？這 80 年來是以臺灣的立場出發呢？抑或是以中華民國為立場呢？這必須說明清楚。今既指涉我國，即中華民國，那 1930 年臺灣總督府在臺施行的「史蹟法」是否宜列入本章範疇呢？宜再審慎考量。又 1930 年公布的「古物法」為我國文化保存之起點，但本章以 290 餘字交代在臺施行 38 年的「古物法」，此論述比例顯然不均，故本章不僅論述主體不清，也混淆了撰述比例的輕重。

又章末論文化資產機關之經營規模，尤顯多餘。此命題亦顯示作者不甚瞭解現行文化機關之組織編制。以業務功能論，全國文化資產業務在 2005 年修正的「文資法」已做出重大調整，之前內政部管古蹟，教育部管古物，而歷史建築歸文建會，自 2005 年後文化資產除自然地觀一項外，全歸文建會管轄。然 2007 年文建會業管之文化資產業務又移轉至文化資產總管理處

籌備處。<sup>24</sup> 故討論該管機關的經營規模，應該追蹤主管機關的預算額，故 2007 年 10 月 17 日以後，應以「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為對象，而非文建會。

又內開中央政府文化支出（表 3-3）、預決算執行率（表 3-4）、文化設施金額比例（表 3-6）、文化數位建置金額比例（表 3-7）、文化創意產業金額比例（表 3-8）等諸表，略顯冗亂，部分與章旨無涉，或可刪除整併。頁 49 又開列地方政府文化支出與人力運用的論述，作者可能疏於關注各縣市文化局職能運作，以全局總預算與職工總量瞭解文化資產業務支出水準，有失高估，故統計意義不大。

## 6. 文化資產的分類概說宜再斟酌

第四章係討論 2005 年版「文資法」第三條第一至七款暨同法第八十八條指定保存技術、傳習及人才等八項，作者依此八項細分八節論述，此分類未嘗不可，但過於冗長，而影響各章的均衡。今建議可分有形文化資產類、無形文化資產類、文化資產經營管理，以及保存科學與技術等 4 節分別敘述，或許較為妥適。再考法律精神本諸於實踐，條文規範僅是展現制度框架，若能多方考察律法運作之動態效能，揭發其意義效果，或許更有價值。因此，本書若能探討爭議性個案或歸納分類已裁定案例，更能展現其制度專業的洞識。

## 7. 文化資產跨界連結的議題

今文化資產再利用與跨界連結係該領域內討論熱點之一，作者主張文化資產與觀光遊憩進行跨界結合，甚至連結文化創意產業。前者雖不難理解，但後者難度就大多了。頁 143-144 呼籲政府應運用多元文化創意資源，並運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進行產業提升，但何謂多元文化創意資源呢？有何內涵呢？又如何運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呢？此點宜做一具體的說

---

<sup>24</sup>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基於「文資法」第 11 條之法律授權，並經 95 年度立法院第 6 屆第 2 會期教育及文化、預算及決算兩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始著手規劃籌設「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專責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業務。

明，今作者雖揭保存與應用互為表裡，應發表其獨到特出的見地，但全書所見早已推動的政策，卻對文化資產與文化創意產業如何結合呢？有何具體策略呢？介面該如何建構呢？卻隻字未提，讓人意猶未盡。

## 四、結論

誠如上開評論，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行動暨法制化絕非國族認同的激化，兩者也非僅存單一對應的關聯。它雜揉歷史與現實等多重構因，其中有必然性的時空因子，亦有偶然性的歷史際遇。今作者過度單一化「國族認同」與「文化保存法制」因果律，再囿限於「國族認同」意識型態的窠臼，且又經不起一手史料的檢驗。不禁試問日本在臺施行「史蹟法」果真是「國族認同」之使然嗎？又國民政府的「古物法」仍是「國族認同」之作祟嗎？從上揭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公、私檔案的引證，相關史實恐怕未必如作者所稱，故其持論不僅暴露疏於查考與深入探究，又撰述上已陷因果推導的謬誤。

今作者係具制度史素養的研究者，欲藉本書展現其對我國文化保存法制的回顧與關懷，此熱情值得敬佩，但熱情有餘、專業不足。今制度史無非探討制度變遷的核心動力暨探尋制度的動態軌跡，進而發現獨到的「通」見。檢視緒論與結論除以「國族認同」為詮釋架構外，相關內容僅以 2005 年版「文資法」條文規範呈現，實無法體現架構與內容一統性的關聯，亦無法展現其論述與史實一致性的連動，更無法提供讀者瞭解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制開展的主軸線索，實負「概論」之名，而僅見筆記之功。